

# 叫了你19年“薛世海”，原来你真的叫薛世海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胡丽芳

4月17日上午9点13分，德清高铁站，随着G1379列车的徐徐启动，4号车厢10B靠窗而坐的一名中年男子一直看着窗外。正是人间最美四月天，空气中都是阳光的味道，男子表情舒展，流露出新鲜和好奇。

男子名叫薛世海，1966年出生，这是他第一次乘坐高铁，也是第一次购买实名制火车票，他此行的目的地是远在几千里之外的老家——贵州丹寨县兴仁镇台辰村。而就在几个月前，他是不是叫薛世海、多大年纪、家乡在哪里，都还是个谜。

帮薛世海购买火车票并送他回家的人，是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副主任医师袁国锋以及医院医务科副科长尹盾、政工科副科长胡丽芳。在过去的19年里，他们几乎与薛世海朝夕相处。这张回家火车票的背后，是安康医院医护人员19年悉心照料薛世海并帮他寻亲的暖心故事。



薛世海坐上回老家的高铁

## 身份成谜的流浪汉 得到悉心照顾

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是全国较早创建收容治疗危害社会治安精神病人的专门机构。

时光倒流到2000年，10月1日，安康医院接收了一名由杭州滨江西兴派出所送来的疑似患有精神病的流浪汉，此人蓬头垢面、衣服又脏又破，说话口音没人听得懂，表达不出名字、年龄、家庭住址等重要信息。

医务人员根据男子模糊的发音，推测他名叫“薛世海”，悉心照顾他的同时，努力寻找“薛世海”的真实身份信息，可是多年来一直未果。

袁国锋是安康医院临床二科五病区主任、精神科副主任医师，和薛世海相处这么久，特别想为他找到亲人。2018年8月，在上级技术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大家通过最新、最先进的技术将“薛世海”的头像在全国人口信息系统进行比对。

比对信息显示，有9个人和“薛世海”有着较高的相似度。袁国锋和同事们十分振奋，“在医院待了18年之久的薛世海终于有机会回家和亲人团聚了”。

为了避免遗漏任何信息，袁国锋他们通过外省警方和有关部门，对这9个人的信息逐个核实，可惜，这9个人被一一排除了。

## 研究配音演员对口型 找到突破口

“我们不想放弃，专门研究配音演员如何对口型，继续从薛世海的口音中找线索。”袁国锋说，希望这种“土办法”能带来突破口。

有人提出，薛世海的口音好像是贵州一带的。于是，袁国锋他们把贵州省各个地市的名字打印出来，然后模仿薛世海常发出的喃喃声读给薛世海听，一边读，一边观察薛世海的表情。

在不断的沟通、交流中，薛世海提到一



医护人员给薛世海送来新衣服并做心理辅导

个叫“shaoze乡”的地方，但查无此地。在此后反复模仿、反复纠正中，袁国锋终于发现，薛世海说的其实是“烧茶乡”。袁国锋上网一查，贵州省丹寨县有个“烧茶村”，再联系上当地派出所的罗警官，得知烧茶乡于1992年前后更改为烧茶村，原来的烧茶乡有好几万人，一时难以确认薛世海是不是那里的。

回头，袁国锋再与薛世海交流时，他突然说出老家在“taisheng村”。袁国锋把薛世海的发音录下来，发给罗警官，很快锁定一个叫“台辰村”的地方。

这一次，薛世海的真实身份和家庭地址终于浮出水面！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确认“薛世海”的真实名字就是薛世海，苗族，老家就在贵州省丹寨县烧茶乡台辰村。

## 为他找到家人 送他回贵州老家

“如果不是接到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

院的电话，我一直以为二哥早不在人世了。”薛世海的弟弟薛似平在深圳打工，他在安康医院医护人员的帮助下，与薛世海进行了视频通话，“二哥现在长得白白胖胖，看上去比我还年轻。”

根据薛似平的讲述和从贵州警方了解到的信息，薛世海自幼智力障碍，没上过学，家里也没给他上户口，一直是黑户，在全国人口信息系统也找不到他的信息。薛似平提到，薛世海1992年跟老乡去深圳打工，但不久就与家人失去联系，“我和老乡在广东找了1年多时间，也没得到二哥的任何音信，还以为他遭遇了不测。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好好活着。”薛似平说，贵州老家还有大哥在，他和大哥已经商量好了二哥回到贵州老家后的生活安排。

送薛世海回家的袁国锋介绍，薛世海出院时身心状态良好，情绪基本稳定，医院为他准备了精神康复所需的药品。在与贵州警方联系开好薛世海的身份证明并购买火车票后，袁国锋他们还特地给薛世海做了心理辅导，还给他换了一套新衣服，“送他高高兴兴地回家”。

# 男孩放声痛哭：“我自己都找不到的爸爸，社工哥哥帮我找到了” 长歪的小树扶一把，能成参天大树

(上接1版)

可惜，小杨是外地来的流浪儿童，找不到父母，没有工作，没有固定居住地，那时也没有帮教基地，没有专业社工可以进行“一案到底”的观护，小杨没能获得附条件不起诉。但马灵剑一直关注着这个孩子，待小杨刑满释放后，她陪着小杨一起找工作，和他分享拿到第一份工资的喜悦，至今仍保持着联系。

## 一套全省首创的机制

正是小杨案中的“可惜”，让马灵剑开始思考：怎样利用社会力量，让更多像小杨这样的罪错孩子有更多改正错误、走上正途的机会？

2013年，路桥区检察院开始着手探索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很快，路桥区检察院未检部门面向社会公开招募30名“曙光”志愿者的消息，在当地引起震动。短短几天，就有150多人报名。“曙光”志愿者团队成立后，路桥区检察院又陆续组建起“爱·倾听”心理工作者、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者和司法社工团队。路桥的爱心企业也加入进来，成立了7个未成年人帮教



检察官和涉罪未成年人谈话

基地。依托14名“爱·倾听”心理工作者、30名“曙光”志愿者、108名未保工作者、5名少年司法社工和16名基地帮教人员，全省首创的“少年司法一体化”社会关怀机制渐渐显出成效。

陆浩是少年司法社工团队的负责人，有着近10年的司法社工经验，被孩子们亲切地喊作“浩哥”。

司法社工接触涉案未成年人的第一步，几乎都是从家访开始。但很多时候，家访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很多未成年人外出后多年不和父母联系，没有父母的电话，更说不清父母在哪里。有一次，一个孩子告诉陆浩，他爸爸在路桥方林汽车城一带

开拉面馆。出了看守所，陆浩一路开车到方林汽车城，转了一圈后发现，这里有大大小小十多家拉面馆，哪一家才是？

后来，陆浩终于找到了孩子爸爸，是他一家家拉面店跑去问出来的。那天，当陆浩带着孩子爸爸去看看守所亲情会见时，男孩放声痛哭，他没想到，他自己都找不到的爸爸，社工哥哥帮他找来了！

## 一块热乎乎的烧饼

接触近百个案后，陆浩发现，涉罪未成年人普遍家庭问题突出。在路桥，虽然司法社工的帮教“一案到底”，但社工无法陪伴他们一辈子。所以，修复家庭关系，是他们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

去年，路桥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电信诈骗案，案中涉及14个未成年人。取保候审后，适逢高考的14个孩子，全都考上了大专院校。他们能否获不起诉处理？路桥区检察院专门为他们开了一次不起诉公开听证会，陆浩也作为司法社工参与听证。

听证会安排在早上。陆浩记得，14个男孩的父母全都来了，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一个爸爸，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才赶到路桥，父子见面时，陆浩从他们的动作

看得出，父子俩关系疏远。听说爸爸赶来参加听证会连早饭都没吃，陆浩有意拉近父子距离，让孩子赶紧去给爸爸买点吃的。等男孩买来早餐递给爸爸时，陆浩发现，热乎乎的烧饼竟是男孩从衣服里掏出来的，“当时正是早春，天冷，孩子怕饼凉了，就贴着肚子一路焐着拿过来。”一块热乎乎的烧饼，拉近了父子间的距离。马灵剑说，听证会上，14个男孩的父母全都主动道歉认错，愿意赔偿被害人损失，孩子们也因为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且认罪悔罪得以不起诉。

每天和这些曾经犯过的孩子打交道，马灵剑和她的伙伴们发现，这些孩子大多内心是善良的，经过帮教后，他们对未来都满怀希望，那棵心愿树足以为证，“望自己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希望一家人团聚”“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学好专业，孝敬父母，减少他们的负担，做一个好儿子”……有些心愿还被贴到很高很高的树梢，因为他们听说这样愿望会更容易实现。

“他们就像受伤的小树苗，但只要身边的人为他们搭好保护架、做好支撑，它们会有自己的力量去努力生长，最终长成一棵参天大树。”马灵剑说。